

坚守初心使命的徐特立

□ 叶 松

徐特立一生走过了一条由苦难到辉煌的道路，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等不同时期。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立志为社会服务。正因为有了这份初心和使命，他总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抉择，并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徐特立德高望重，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创造事业，用教育来改革人心

19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令人煎熬和困惑的岁月，列强侵略、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沉浸在迷惘中的有志之士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此时，一些宣传维新变法和介绍“西学”的读物开始在湖南传播。维新派的出版物很快引起了正在家乡教书的徐特立的注意，他经常前往长沙城购买新书报，关注社会脉搏和时代风云。他特别赞赏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的论说和谭嗣同的慷慨激昂之作。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民族危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改良的道路自然就走不通了。

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徐特立感到愤慨、迷惘，忧国忧民的思绪，促使他下定决心，结束塾师生活，报考宁乡速成师范学校。1905年春，徐特立考入该校一个学制为四个月的速成班。在这里，徐特立学到了新的科学知识和教育方法，特别是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学习之余，他还经常阅读新式读物，思想很快发生变化，“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毕业之后，徐特立抱着“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的奋斗目标，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学校以开发民智、教育救国为宗旨，专招农民子弟入学，附设速成师范班和女子班，这改变了长沙附近农村没有新式学堂的状况。

辛亥革命爆发后，徐特立积极响应，支持革命。长沙新军起义胜利后，他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由于议会内部分争权夺利、背叛人民，徐特立意识到革命政党已经变质，愤然辞职，回到教育界。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培养更多师资力量，徐特立应长沙县知事之请，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担任校长兼教员。担任校长期间，徐特立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负债600多元。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使徐特立深受感动，他感到国家有前途、有办法了。为了学习救国本领，1919年9月，42岁的徐特立在“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期间他还前往德国、比利时考察教育，直到1924年7月回到祖国。

徐特立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艰辛跋涉、艰苦创业，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像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蔡畅、李维汉、许光达、田汉等都是他的学生。

革命救国，在党组织里获得新生

地位、金钱并不能阻挡徐特立前进的步伐。论地位，他已是湖南有声望的教育家，多所学校争相聘请他担任教员，许多学校的教员还是他的学生；论收入，他的教书所得已是十分可观。但是，地位和收入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困惑，黑暗的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1926年冬至1927年春，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徐特立回到五美乡调查农民运动。令他惊讶的是，曾经熟悉的家乡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流氓、烟、赌也不见了。过去政府禁止鸦片毫无办法，现在农会晚上开个会，男女老少一起行动起来，马上就禁绝了。天朗气清，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徐特立一边赞叹妇女和儿童的伟大，一边感慨地说：“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让徐特立看到了救国的希望。他虽然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出路，直到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伟大作用，他才看到了光明。他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信仰再也没有发生改变。他放弃了奉行多年的“教育救国论”，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从学校跳到农民协会工作”，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全力以赴地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冒着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老战士。教育家徐特立入党的消息极大地振奋了危难中的同志，许多同志感慨地说：“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啊！”陆定一高度评价徐特立入党：“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对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决的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入党以后不久，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徐特立担任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翻越闽赣边界的武夷山时，徐特立因劳累过度，体力不支，病倒了。高烧不退的徐特立被送进了长汀福音医院。住院期间，徐特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让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燃起了革命的火苗。后来，傅连璋放弃了待遇优厚的院长职务，投身到极其艰苦的革命事业之中。

加入党组织后，徐特立觉得自己“从此真正获得了新生”。他解决了政治上的苦闷，精神也变得愉快起来。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上来。在徐特立的鼓励下，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参加革命，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4年10月，57岁高龄的徐特立参加了长征。长征中，徐特立将马匹让给伤病员，忍着饥饿带头挖野菜，教战士识字，亲自下河探路，鼓励战士们要克服困难、勇往直前，逐渐成为红军队伍中无形的精神力量。

到达陕北后，徐特立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之中。

1937年12月，徐特立以高级参议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1939年2月起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从延安回到长沙后，徐特立就投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繁重的工作之余，徐特立还念念不忘湖南的困难同志和留守的家属，他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情况，申请经费救济和帮助他们。

入党后的革命斗争是十分艰苦的，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但徐特立没有丝毫害怕，他时刻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坚守初心，传承革命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徐特立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了，在常人看来似乎可以坐享清福、颐养天年了，然而他并没有丝毫懈怠，而是坚守初心，尽心竭力地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之中。

进入北京后，徐特立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劲头和学习状态，“每天坚持8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忙个不停；他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为了鞭策自己，他还制订了一个20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在繁忙工作中，他挤出时间学习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徐特立写下许多教育论文，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对于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初心和使命的传承，徐特立是十分重视的。他对广大青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继承革命前辈“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崇高品质，继续开创共产主义之业。在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时，徐特立著文指出：“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公，哪有私；没有集体，哪有个人”，“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是‘给’，而不是‘取’”。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与世长辞，享年91岁。逝世前，他留下遗言：过世后，把遗体献给医学科学部门。至此，徐特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践行了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初心，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徐特立逝世后，毛泽东在审定悼词时亲笔加上“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高度赞扬了他不平凡的光辉业绩。（摘自2020年第7期《百年潮》）



罗炳辉（1897—1946），原名罗德富，字宿星，云南彝良人，是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

1939年5月，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坚持对日作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1940年4月5日，罗炳辉在取得半塔保卫战胜利以后，抵达天长县大通镇。得到罗炳辉率部抵达的消息，中共天长县委书记周利人和县委干部徐速之便由铜城赶到大通镇去汇报工作。周利人等向罗炳辉汇报了筹建天长县抗日民主政权的情况。罗炳辉听后，又详细地询问了天长县的风土人情，还听取了敌伪军的分布和活动情况、民众抗日的宣传和组织情况以及社会上层各界人士及开明士绅的情况汇报，每一个问题都了解得很细密。他还就政权建设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问题，军政团结、军地配合问题向周利人等作了许多指示。

天长地理位置独特，高邮湖钺于市境东北，隔江与南京相望，是连接苏皖两省的重要纽带，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新四军进驻此地，引起日伪顽的震惊和恐惧。他们互相勾结，准备对新四军“扫荡”袭扰。面对敌人的种种阴谋，罗炳辉毫不畏惧，将支队司令部设在大通后，他只率部分战士及民运工作队继续向东挺进。4月8日拂晓，罗炳辉与中共路东省委书记方毅率部抵达安徽省天长县铜城镇。

罗炳辉一到铜城，就立即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普遍欢迎。在当地民众召开的万人大会上，罗炳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国民党顽固派原想勾结日伪东西夹击，消灭津浦路两侧的我党我军。经过我党政军民的密切配合，坚决反击，迅速消灭和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权，发展了武装。从此，有了自己的家，不再受人欺侮和摆布了。我们一定要把家治好，巩固根据地。希望大家更加团结一致，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罗炳辉的讲话博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由于罗炳辉在粉碎日伪军“扫荡”和收复复来安城的战斗中威名远扬，淮南的群众中到处流传着“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国民党天长县县长，是一个顽固派分子，他得知罗炳辉率军抵达后，做贼心虚，立刻逃得无影无踪。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宣传，一些士绅、商人对新四军存有戒心，担心被“共产”。昔日车水马龙的铜城镇，忽然变得冷冷清清，街上没有几家店铺开门营业。

罗炳辉深知，要在此创建抗日根据地，必须团结各界力量。为了解除一些人的疑虑，罗炳辉率新四军进城后，一面吩咐民运工作队的同志上街宣传，解释我党的方针政策；一面找来这里的商会会长，拟定各大商户及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名单，书就朱红请柬，派通讯员逐一送至各户，邀请他们前来

罗炳辉交心做统战

□ 贾晓明

参加罗司令员的宴会。

一天正午时分，罗炳辉身穿普通战士的粗布灰军装，脚穿草鞋，等候在铜城普济寺桥畔的当地一家知名茶酒社门前，亲自迎接来宾。他与来者一一握手，把客人们引进房中落座。席间，他谈笑风生，频频举杯向大家敬酒。宾主交欢，宴席沉浸在一片和谐诚挚的气氛之中，紧张的气氛得到缓解。酒宴过后，众宾客都随罗炳辉来到刘氏宗祠。在这里，罗炳辉谈起我党我军的宗旨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针对士绅、商人们的疑虑，罗炳辉开门见山地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浴血奋战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是为了帮助人民，保卫家乡，实行民主政策。诸位都是通情达理、耳目聪颖的人士，我军所作所为，有目共睹，请诸位不要听信顽固派的谣言。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我们就要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组织各种群众团体，欢迎诸位参加我们的工作！”同时，罗炳辉还提出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征收公粮和税收等合理负担的经济政策。这一番话，直说得在场士绅、商人频频点头，疑虑也就此全都消释了。

此后，大部分中小地主和开明士绅、商人纷纷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战工作，天长各阶层民众很快发动起来，工抗会、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商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迅速建立。

（摘自2020年3月12日《人民政协报》）

为六角钱作检讨

□ 徐 杨

20世纪40年代，董必武任中共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长期住在红岩村，同时承担了南方局很多具体事务。一天晚上，办事处的同志围坐在红岩村救亡室里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应董必武的要求召开的，会议开始后，董必武取下老花镜，翻开笔记本，认真地看了看大家，就开始作检查。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不久前，红岩村办事处招待所的所长把报账的票据拿给董必武签字。董必武翻看发票，都是买菜、买米、买煤、车票之类的日常开销，经审核后属于报销范围，就签了字同意报销。所长在报账的时候，办事处的出纳却发现有一角钱的车票是私人坐车，按规定是不能报销的。此事很快反馈到董必武那里，董必武又重新审查了一遍，认定那六角钱的车票确实不能报，便叫所长把六角钱的车票取出来了。

这件事情完全是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按理说，发现后纠正过来就行了，但董必武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它提到一个高度上来，要在办事处召开会议作检查。

董必武在会上说：“当前办事处除了工作处在虎穴之中，做事要认真、谨慎外，生活也很困难，必须艰苦度日，每一样东西都要从节约出发，不能铺张浪费，每分钱都要计划着用。”

董必武说到这里，把话题一转，说到自

人民军队首次大阅兵

□ 周铁钧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会期几经易改，最后定为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开幕，同时还决定：为庆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阅兵仪式。

人民军队首次大阅兵的场地选在瑞金县叶坪村，村东樟树林边上有一大片草地，平坦开阔。1931年11月1日，从各部队抽调的4000多名官兵到位，被编排成20余个方队，开始为期一周的抬炮持枪、队列正步等训练。

当时，常有国民党飞机袭扰，部队在远处的山头设监视哨，发现敌机立即鸣枪示警，受训部队迅速进入林中隐蔽。为应对敌机空袭，确保安全阅兵，红军还在距叶坪村1公里左右的地方建了个假会场：“检阅台”高大宽阔，绑满松枝，四周彩旗飘舞，同时布置了30多挺防空机枪。真正的检阅台背依叶坪村东的樟树林搭建，横梁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阅兵台”会标，后幕悬挂马克思、列宁画像，两侧是工农红军军旗，显得宽敞简洁、威严肃气。

11月7日，天还没亮，部队从四面八方向叶坪村聚集。6时30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彭德怀、陈毅等37位大会主席团成员登上检阅台，朱德总司令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会场响起一片欢呼。

主席团成员回到台上，远处突然响起激烈的爆炸声和枪声，原来，有4架敌机

飞到叶坪村上空，它们盘旋一阵，发现了假会场，开始投弹、扫射，红军的机枪同时对空开火，吓得敌机不敢低飞，但他们看到“会场”被炸成一片火海，以为大功告成，才得意扬扬地飞走了。

没有敌机骚扰，官兵们的激情更加高涨，在嘹亮的鼓号声中，阅兵开始。最先走过检阅台的是平射炮方队，两匹马拉一门大炮，四门一排，共十排，马蹄阵阵、神勇威武，紧随的是重机枪方队，四名战士抬一挺水压重机枪，四挺一排，共十排，两组重机枪方队走过，跟来轻机枪方队，100名战士每人竖抱轻机枪，齐整步阵，如流动的钢铁，接着是步枪、警卫、军校等方队，个个威风凛凛、雄姿英发……

人民军队的首次大阅兵，充分显示了红军的强大力量，宣示了人民军队誓死保卫红色政权的坚定信念，极大鼓舞了根据地人民。

（摘自2019年9月23日《北京青年报》，原标题为《1931年 人民军队首次大阅兵》）

